

介入、反思、批判： 談王蒙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堅守

張立軍¹

摘要：王蒙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引領者，他的文學創作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品性和時代屬性。王蒙通過人物命運與情節發展的辯證性構述實現了小說對人生、對社會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終貫通着一種批判意識，這也是王蒙以文學反思歷史、探討文化的重要方式。對現實的關注、辯證法的運用以及帶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構成了王蒙創作中現實主義品性的三個重要維度。王蒙的小說創作，將現實主義品性與故事情節、人物的表現完滿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為當代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典範。在新的歷史發展語境下，王蒙文學創作內蘊着的現實主義品性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提供了至為寶貴的經驗，探討其創作中相關問題對於豐富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

關鍵詞：王蒙小說；現實主義；關注現實；辯證性；批判性

王蒙的文學創作在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筆觸，特別是他的小說深度介入現實，關注政治生活，刻畫時代風貌，集反思性、歷史性、批判性於一體，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文學的風範。《青春萬歲》《组织部來了個年輕人》《活動變人形》“季節系列”（《戀愛的季節》《失態

¹張立軍，男，文學博士，二級作家，《藝術廣角》編輯部，遼寧大學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文論。

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這邊風景》及《笑的風》等作品緊扣時代脈搏，勇於突破創新，他的創作始終與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相向而行，從文學史意義上開時代文藝風氣之先，王蒙及其作品不但見證並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更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的開拓者和引領者。今天，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史的時代框架下審視王蒙的小說創作，其創新性、探索性、豐富性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提供了至為寶貴的創作經驗，從其作品體現的現實主義品性來看，其作品回應時代、反思人生，是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典範。探討王蒙文學的現實主義品性對於新時代現實主義文藝創作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一、以小說介入現實，體味生活、感悟人生

王蒙小說最鮮明的現實主義品格體現在其作品對社會、對人生、對現實的關注上。關注現實、介入現實是現實主義文藝創作的基點。社會主義文藝是實踐的文藝，它是馬克思主義實踐文藝觀在文藝領域的具體體現，它重視文藝與現實的關聯，具有強烈的現實介入性，它積極真切地關注社會生活、反思社會日常，將對社會變革的關懷寄寓於對未來的燭照之中。為此，社會主義文藝特別關注文藝在社會革命、社會建設、改革等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所體現的價值和意義，與此同時，它也更關注生命個體在社會中的存在狀態。王蒙的小說正是這種對中國現實主義文藝的回應，他高度關注時代及時代在人的生命中蝕刻的印記。

從整體觀之，王蒙小說對社會的關注與對人的關注相容為一，形成了社會與人的互文互構關係。在他豐富的作品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關注現實、反映現實成為其創作的主線。從20世紀50年代的《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到改革開放後的《蝴蝶》《布禮》《活動變人形》等，再到“季節系列”及《這邊風景》《笑的風》，等等，可以說王蒙小說的創作是

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縮影，他作品中所呈現的時代背景以及關注的各種具體問題正是社會發展的現實情形，是現實社會發展過程中其人其事的凝縮和提煉，也可以看作是社會主義“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的融合。王蒙的這種創作，從寫作本身呈現出一種歷時的延續性，在他的近作《笑的風》中仍能見出這種延續性，作品仍將主人公傅大成的人生經歷和命運軌跡，置於 60 年的宏大中國社會變遷之中，可以說作家在構述人物的同時也在為時代的遷移做著記錄。王蒙將社會與人相牽連，兩者之間互相映襯，他的小說正是通過社會的變遷呈現了歷史語境下人的轉變。從《青春萬歲》（1953）到《笑的風》（2020）、《猴兒與少年》（2021），王蒙小說中塑造的鄭波、林震、鐘亦成、張思遠、錢文、倪吾誠、青狐、蘇爾葆、傅大成、施炳炎等人物形象構成了一個有完整體系的具有某種關聯的人物序列。他們之間所運行着的流變的內在邏輯便是人隨着社會的發展與遷移而作出的對應性反應。如沈杏培所言：人物“清晰地存在着一個關於人的‘被縛’與‘脫縛’的精神脈絡”，人物構成的形象序列，“隱含着由‘政治人’到‘自由人’的形象譜系歷時性變遷，而在價值層面體現了由革命倫理和政治倫理本位向個體倫理和自由倫理的轉化。”¹

在王蒙的小說創作中，對社會的關注集中表徵為小說對政治生活的或隱或顯的描寫。無論從《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還是《戀愛的季節》等“季節系列”及《這邊風景》等作品，政治因素都成為作者思考的核心或重要問題。就具體生活實踐而言，王蒙的創作從自身的生活入手，但他並不是嚴格按照生活原貌移植和再現，他更注重自我的體驗和生命感受。王蒙曾將自己定位於“既是生活的實行者、當事者，又是生活的欣賞

¹ 沈杏培：《從“政治人”到“自由人”：王蒙小說中“人”的變遷及其危機》，《文藝理論研究》2022年第1期，第115頁。

² 王蒙：《傾聽着生活的聲息》，《王蒙選集》第1冊，第2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者、觀察者”的作家²。而在當代作家中王蒙又是與政治、革命發生關聯較為密切的作家之一，這就決定了特殊經歷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季節系列”¹橫跨了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30年，故事從20世紀50年開始，到“文革”結束，主人公錢文的身上留有鄭波、林鎮、種亦誠、周克等人物形象的影子，同時也處處透顯着“王蒙個人經歷的烙印”。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政治人”在王蒙小說中成為具有時代烙印的“典型人物”，從《青春萬歲》中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鄭波、楊薔雲、李春等青年群體，到《组织部來了個年輕人》塑造的“林震式”人物，再到《蝴蝶》《布禮》《雜色》《相見時難》等的鐘亦成、張思遠、曹千里、翁式含們，他們都有着近似的政治信仰和時代理念。小說中這些人物在社會變革浪潮中的激蕩以及這種文學與政治關係的搭建，一方面是王蒙親歷生活在文學中的剪影，同時也是作者對現實生活的反思和超越，這種政治與生活的對應正是王蒙以文學的方式反思現實生活、重新審視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重要體現。

王蒙小說不僅對政治、對人物有着深切的關注，他更對社會現象背後推動整個社會、民族發展和運行的中國文化有着更具深度和前瞻的關注和體認。與文化研究者相比，王蒙對文化的關注是具有現實性的。就所從事的崗位，以及所經歷社會發展歷程看，王蒙對文化發展有着獨特的思考。他佔據了作家、學者和政治家的立場和視角來歷史性、全局性地思考中國的文化問題。“建設性”和“文化大國”概念，構成了王蒙文化觀的基本架構。在20世紀80年代末，他就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中國是一個古老而又年輕的大國。中國對於世界是重要的。中國對於21世紀是尤其重要的”，“這是因為，與中國的目前的經濟實力並不同步，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東方文化大國。這是當今世界以歐洲為源頭的文化潮流的最重要的參照系”，

¹《戀愛的季節》（1991）《失態的季節》（1994）《躊躇的季節》（1997）《狂歡的季節》（2000）

“要從世界的觀點、21世紀的觀點、全球的觀點考慮中國文化的地位和前途。並安排好中國文化的發展、建設、改革、開放，從而塑造中國的應有的形象，發出中國的應有的聲音”。¹201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王蒙談文化自信》一書，將王蒙重要的文化觀念進行了系統的梳理。這其中延續了王蒙對“文化大國”和“文化自信”的闡釋。王蒙的文化觀可以說是立足於中國傳統，放眼於世界，建設文化大國、強國是他的文化觀，也是他文學創作的重要意圖所在。《在伊犁》《這邊風景》等小說不僅記錄王蒙在異域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對新疆的地理風物、民俗文化等進行了整體的書寫，其在展現新疆地域文化風貌的同時，展現的是中國文化中更為廣闊的包容性。

從王蒙小說對現實的關注中，我們也能夠見出王蒙創作的責任擔當與歷史使命感，這不僅揭示了王蒙小說所反映出的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的根由，而且更讓我們理解到王蒙所建立起來的文學與政治、與人之間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是要運用現實主義精神穿透歷史的迷霧，將某些不堪回首的歷史以景觀的方式展示與再現，意在為社會意識提供更為具體和真切的反思對象，從而獲得一份警醒。

二、用辯證思維融灌小說，反思人生、超越現實

王蒙的小說創作經由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回溯到了對現實的審視與對歷史的反思。唯物主義辯證法是建立在黑格爾《邏輯學》基礎上的辯證思維，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源於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在《自然辯證法》手稿的《辯證法》中，恩格斯提出：“辯證法的規律無非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方面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它們實質上可歸結為下面三個規律：量轉

¹王蒙：《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化芻議——一個筆記式的提綱》，《王蒙文存》，第503—5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

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¹ 從辯證法“三大規律”審視王蒙小說創作，可以更清晰地見出其中蘊含的質樸的辯證性。

從創作整體看，王蒙小說中的辯證性體現在人物命運遭際和性格發展的全過程。小說主人公的命運遭際和從苦楚中的自我抽離不僅詮釋了“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性，《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林震的浪漫主義的理想遭受挫折後，理想仍未改變。在王蒙的小說中，政治與人物之間相互糾纏，他們充滿着與矛盾、與鬥爭之間時而尖銳、時而和解的狀態之中。《這邊風景》中“我臨離開新疆時”對新疆的熱愛、對周圍人的熱愛、對理想的追求仍未改變，那種樂觀和積極對未來堅定的信念仍未改變。《布禮》中的鐘亦成被錯劃成右派，小說展現了主人公與社會之間尖銳的矛盾，儘管他委屈，心靈受到創傷，但他對黨的堅定信念始終沒有動搖。《蝴蝶》中完成了張思遠丟魂尋魄的過程。當張思遠從一個從人民中來的革命者，成長為市委書記後，三四十年間他與人民的距離越來越遠，他起先作為人民公僕與人民的一致性由之轉變為與人民對立，這種矛盾即是張思遠內在的人格變化，也是他與人民、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變化。當他被改造、參加勞動後，他才逐漸恢復了同人民的聯繫。小說正是通過這種矛盾衝突與和解的方式才完成了張思遠的性格塑造。這種理想的堅守以及矛盾衝突的和解，並不是平淡無奇和原地不動的，而是在外界環境的影響下，經過人物內心的反復鬥爭和掙扎的結果。這種人物性格和命運的塑造，是矛盾對立和“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結果，人物的命運以及背後的事件和社會也正因此而獲得了一條盤旋上升的發展路徑。

¹（德）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第75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從人物性格的塑造看，王蒙小說充滿了發展的視野和積極樂觀的情緒。在他塑造的人物中，當他們屢遭挫敗後，仍舊對未來充滿憧憬，仍舊秉持着“雖九死其尤未悔”的生命態度，這也正體現出王蒙在小說中對待未來的那種充滿辯證性、發展性的思考視角。當鐘亦成（《布禮》）被“小將們”的皮鞭和鏈條打得要失去知覺的一剎那，他看到的是那“永遠新鮮、永遠生動、永遠神聖而且並不遙遠的一切”，因而在他“帶血的嘴角上出現了發自內心的笑意”，當翁式含（《相見使難》）“終於度過了嚴冬”，剛剛回到“暖人的春光裏”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恩怨和應得的補償，而是人民的好處和共產黨員的“天職”——“不僅用語言，而且用事實”來回答美籍華人關於理想主義破滅的問題。此外，如秋文對張思遠的“別忘了我們”的囑願（《蝴蝶》），呂師傅對唐久遠的實現“三點政綱”的期待（《悠悠寸草心》），曹千里和他的灰雜色老馬的終於奮飛（《雜色》），楊恩府和他的藝術青春的燦然再現（《深的湖》）……這一切正像作者所一再申言的那樣：“對於青春，對於愛情，對於生活的信念，革命的原則與理想，我們仍然忠貞不渝，一往情深。”¹《猴兒與少年》中施炳炎不關注在勞動面前身體的痛苦，而是對勞動經驗進行戀戀不捨的深情訴說，施炳炎在背背簍、雨季造林運動中獲得的是思維的馳騁和心靈的逍遙奔放。這種對社會、對未來的積極熱望，對現實處境樂觀的態度，蘊藏在堅定的理想之中，正是社會主義文藝創作以發展的視野看待社會遷移的真實的呈現。在盧那察爾斯基看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首先是一種發展的現實主義，它不僅要忠於現實，更要看到未來。他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把現實理解為一種發展，一種在對立物的不斷鬥爭中進行的運動。但他不僅不是靜止者論，他也不是宿命論

¹ 徐俊西：《在社會主義文學的道路上不斷求索——論王蒙小說的創作思想和藝術特色》，《當代作家評論》1984年第2期，第13頁。

者：他看見自己處在這個發展、這個鬥爭中，他確定了他的階級立場，確立了他屬於某個階級或者他走向這個結級的道路，也確定了自己是謀求使過程這樣進展而不是那樣進展的一份積極力量。他確定自己一方面是歷史過程的表現，另一方面又是能夠決定這個過程的進展情況的積極力量。”¹ 這種歷史表現和積極力量的確認成為社會主義文藝作品中對未來發展的一份篤定。

此外，關注現實呈現辯證性獲取對於現實和當下反思的力量，是深藏於王蒙小說辯證性背後的內在邏輯。在他的小說中深藏於政治事件、革命敘事背後更深層的邏輯是對於社會、生活和人生的反思。政治意識的反映源自於王蒙對歷史的反思，系列人物的呈現則源自於王蒙對生活的理解，也正是這種反思構成了王蒙小說的內在主題，即現實主義文藝創作對現實生活的超越，這種超越性也構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特有屬性。南帆曾將“季節系列”中所體現的王蒙的個體經驗概括為：“個人體驗與歷史判斷的共同產物”² 在“季節系列”中自省與反思成為塑形人物的重心，這種反思與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剖析不僅在錢文及其給予認可的犁原、張銀波等人物，還在於作家對自身的反思。在《青狐》中王蒙的反思更深入、更獨特，也更具有超越性。王蒙說：“在歷史轉折中人們常常扮演他所不能勝任的角色”，《青狐》實際上就是描寫的這種“歷史和人的錯位感”“歷史與人的不匹配”。³ 王蒙在這裡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性”進入了一種無可回避的生命境遇。王蒙曾在《我們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實》一文中說：“我的經歷未免是太歷史了，我的命運完全變成了歷史的迴音”，“雖然我主張作家寫得可以個人一點，也可以寫得花樣多一些，但實際上我做不到，我的作品裏，

¹（蘇）盧那察爾斯基：《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蔣路譯，第5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²南帆：《革命、浪漫與凡俗》，《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第55頁。

³王蒙：《王蒙：文學期待的是智慧——王蒙父子關於〈青狐〉的對話》，《文匯讀書週報》2003年12月19日。

除了歷史事件，還是事件的歷史”，“我的寫作，我覺得我確定還是歷史的迴音”。¹

這種現實主義文藝作品中蘊含的辯證性的價值也同樣顯現出對社會現實的反思的意義。當特殊的歷史時段，唯物主義辯證法被簡化為一種方法或工具，並同時或隨時可以成為正題論證和反題論證的支撐的時候，辯證法的尊嚴將消失殆盡，其實質將成為一種無原則、無底線的詭辯論。由此，透過辯證性思考社會意識也成為王蒙小說帶給新時代現實主義文藝創作的啟示。

三、通過批判，省視文化、確立堅守

王蒙小說對現實的關注，對社會歷史的反思，引發了其文藝創作對現實社會意識的批判與匡正。他將批判的視點聚焦於社會現實和傳統文化遺留的糟粕，他將批判的對象貫通於小說中的人物和自我之間，他意圖通過批判實現人文精神的重建。

王蒙小說通過搭建人物與作者的對應關係，完成了對小說人物與自我的雙向批判。“季節系列”（《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具有很強的懺悔和批判意識，批判性成為小說構思及創作的內驅動力，這其中不僅存在對小說人物的批判，更存有其中照見的自我批判。這種批判性源自於小說主人公和作者之間共通的自省與批判精神。“季節系列”小說從“戀愛”到“失戀”從“躊躇”到“狂歡”始終貫穿着一個主題就是對那個“很純很正的理想主義”時代特別是對那個“把人還原成動物”時代的理性反思的批判。何西來認為：“王蒙在季節系列中回首與反思的對象如其說是出現在他筆下的人物還不如說主要是他自己。瞭解一點王蒙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人都不難從錢文身上看出作家的影子這包括經歷、氣質、

¹ 王蒙：《我們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實》，《王蒙說》，第37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生存方式和想事方式等。人們儘管現在還不能徑直說季節系列就是王蒙的自傳體小說或小說體自傳，但無論如何可以斷言這個系列比王蒙過去的任何一部小說都包含了更多的自傳性因素。”¹ 錢文有着職業革命家和人文知識份子的雙重身份，這與作者自身的身份存在共通的應對關係。正是這雙重身份令錢文既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又存有浪漫的人格，而當風暴來臨之時，英雄的氣質與獨立人格隨即被無情地放逐，沈淪還是救贖，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在小說的批判中越發鮮明。錢文的拒絕庸俗和逐漸走向庸俗，即是生活危機也是精神危機的種種表現，王蒙也正是在這種複雜關係中開展這對自我的剖析和審視。可貴的是，作者這種對小說人物命運的省察和自我的批判是坦率而真誠的，正是“吾日三省吾身”觀念在作者內心的寫照和落實。

王蒙對小說人物的批判和自我的省視沒有流於浮表，而是向其背後的隱喻作出更為深層的探討，批判對象也由單一個體向更為廣闊的群體延伸。這種由個人及群體的批判在《活動變人形》中有着較為集中的體現。在談《活動變人形》的創作時，王蒙曾說：“然而我畢竟審判了國人，父輩，我家和我自己。”² 倪吾誠是一個從身體到精神都存在問題和缺陷的形象，他身處現代中國，卻固守中國舊傳統和懷念留洋時的見識，他在日常生活中滿口新詞，動不動就說自己的家人及其他中國人齷齪骯髒，自己卻一事無成。也正因此，在他的身上出現了“兩頭不找落”的情形。小說對倪吾誠審視，延伸到了一個全新的命題，即，對“現代性”的追求與對“國民性”的批判。作為知識份子的倪吾誠是一個時代追求“現代性”的縮影，他曾以西方現代性的文化價值為範本來批判自己的社會和傳統，“現代化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一方面是尋求富強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則是以西方現代社會及其文化和價值為規範批判自己的社會和傳統的過程。”³ 但其實質卻是

¹ 何西來：《智慧的痛苦——評王蒙〈失態的季節〉》，《光明日報》1995年12月6日

² 王蒙：《關於〈活動變人形〉》，《南方文壇》2006年第6期，第26頁。

³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第8頁。

對現代性的誤解和對自身立足社會境況的誤判，因此倪吾誠自身的困頓是無解的，空乏的。然而王蒙正是通過對這一命題的探索，將如何建設現代社會和反思“國民性”推向了思考和批判的核心。在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如何迎接現代性而告別過往的“腐朽”，曾被一度認作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標識，這也成為一對尖銳的矛盾，但真實的現代為何，而陳舊又是否都腐朽，這也成為王蒙小說批判而引發的重要思考。

王蒙小說的批判精神與作者自身對當代文化的批判有着承續關係，王蒙關注文化、關注當代不斷發生變化的複雜文化現象，他以自己本有的立場審視繁複流動的當代文化現象，並積極介入思考、參與討論。20世紀90年代初期，王蒙發表《躲避崇高》和《人文精神問題偶感》，曾因基本肯定“痞子文化”，支持市場經濟而遭受非議，後來引發了“人文精神”討論，這其中王蒙的批判是睿智而目光長遠的。與“人文精神失落”說不同，王蒙認為高度專制主義的文化是無所謂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應該承認人的差別而又承認人的平等，承認人的力量也承認人的弱點，尊重少數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數人的合理的與哪怕是平庸的需要。”¹王蒙認為，祇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承認並尊重人的個性差異性的大眾文化氛圍中，才能產生人文精神。“計劃經濟的悲劇恰恰在於它的偽人文精神，它的實質上是用假想的‘大寫的人’的烏托邦來無視、抹殺人的欲望與需求。它無視真實的活人，卻執著於所謂新型的大公無私的人。”¹王蒙以新啟蒙的姿態審視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人格，他佔據的立場和姿態具有時代的超越性，他不默守陳規，不故步自封，他更看重文化的開放性和時代的引領性，他將這種文化批判立場貫通於他的小說創作之中，為此，在他的小說創作歷程中，一直都有着文化批判的身影。這不僅是作家文化意識內蘊的結果，更是王蒙作為作家的責任與堅守。

¹王蒙：《人文精神偶感》，《東方》1994年第5期，第38頁。

現實主義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要當代形態。經過百年的文學話語流變，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生命力得到不斷豐富和增強。王蒙的小說創作正是當下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典範，在他的小說中，關注現實、辯證性的呈現以及帶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構成了王蒙文學創作中現實主義品性的三個重要維度。王蒙文學創作內蘊着的現實主義品性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提供了至為寶貴的經驗，他的一系列創作，也正因對真實的超越和對現實的關注而獲得了勃勃生機。他的小說創作通過反映現實、關注“人生”，豐富了“人民性”的內涵，在很大程度上充實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論，他將小說人物的塑造、故事情節的構述與辯證性、批判性相融合，令小說在獲取藝術生命力的同時，有了更深的社會批判性和高度的社會認知價值。在新的歷史發展語境下，探討王蒙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問題，對於豐富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